

## 孔子周游列国不遇之原因新探

吕华亮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00092)

[摘要] 孔子为追求理想周游列国却始终没有被重用。其原因不是后人所说的孔子之道“迂阔而不切实际”,主要应归之于以下两个方面:孔子的“正名”主张和为政实践,昏君乱邦。

[关键词] 孔子;不遇;原因

[中图分类号] K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6)10-0053-03

作者简介:吕华亮,男,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孔子从鲁定公十三年春去鲁,至鲁哀公十一年而归(取钱穆观点,参《先秦诸子系年考》),十四年间,周游列国,栖栖皇皇,历经坎坷,却始终没有被重用。究其原因,当今学者大都把它归于孔子之道“迂阔而不切实际”。笔者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反复考查,认为上述看法是对孔子为政思想的一种误解,是没有把孔子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方略与其当下的治国主张相区别开来的必然结果。

孔子“不遇”真的是因为其“迂阔”之道吗?

“迂阔不遇”观是建立在孔子的德治基础之上的。它认为,孔子时代,天下已乱,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地位,皆崇尚法治和武力,而孔子之道具有“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这种带有长远目标的特点。这当然不适当当时急功近利的诸侯的口味,孔子也因此到处碰壁。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我们只要把孔子的有关材料稍加整理,便会发现它的立论缺乏坚实的基础。的确,孔子崇尚德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sup>[1] P11</sup>“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1] P12</sup>孔子一生所崇敬的尧、舜、文、武、周公都是以德治天下的模范,“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sup>[1] P83</sup>“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sup>[1] P84</sup>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孔子理想中的人物和治国方略,是为实现其大道所追求的目标。而现实却是:“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王权旁落、诸侯纷争、卿大夫专政的混乱局面根本不具有实现德治的土壤。这一点任何人都清楚,何况我们的大圣人呢?所以孔子认识到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去开垦一片适于德治开花结果的“土地”,才能使自己理想中的治国方略得以付诸实践,实现自己的大道。而开垦这片“土地”的工具无疑是法治和武力。孟子曾赞誉孔子是“圣之时者”,就是指孔子能因时制宜。所以笔者认为:孔子是不排斥法治、主张使用武力的,并且付诸了实践。(关于孔子德治思想和崇武尚法思想之间的关系,笔者另有专题论述)其证据简述如下三个方面。一,孔子为鲁司寇时所做的三件大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鲁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孔子以武力为后盾和以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理;(2)鲁定公十三年以武力“堕三都”;(3)鲁定公十四年,孔

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七日而诛杀鲁大夫少正卯。<sup>[2] P1915-1917</sup>

二,孔子平时的言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论语》中的有关话语:“子之所慎:齐、战、疾。”<sup>[1] P69</sup>“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sup>[1] P115</sup>“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sup>[1] P126</sup>“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sup>[1] P144</sup>孔子听到陈成子弑简公,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sup>[1] P153</sup>“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sup>[1] P208</sup>《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欲伐蒲,孔子表示赞同。三,从别人对孔子的为政评价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孔子世家》载,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途不拾遗,四方宾客来归,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sup>[2] P1918</sup>在这里,齐人用了“霸”“并”二字,可知孔子为政必尚法崇武。《孔子世家》又载:“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师战于郎,克之。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sup>[2] P1934</sup>

孔子的以法和武力治国的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表现有二:一是上文说的“齐人闻而惧”;二是鲁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文中虽没有指出孔子用什么方法治理中都,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得出法治和武治的结论。因为当时大夫专权,时势混乱,孔子为中都宰,必不可能以德治之,否则中都必不能治;另外,当时诸侯皆崇武尚法,如孔子使用“迂阔”的德治,四方也不会“则之”了。

上述材料不仅可以表明孔子不排斥武力和法治,还表明孔子所追求的当下为政之道不是“迂阔而不切合实际”的德治,而是效果明显的以法治国和以武治国(当然,我们不排除在法治和武力中夹杂着德治的成分)。基于此,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迂阔不遇”观便丧失了其立论基础,成为空中楼阁了。所以我们认为,孔子周游不遇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他所追求的德治的思想和主张。那么其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孔子周游不遇之原因新探

孔子周游不遇的原因应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

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正名”的主张和实践，昏君乱邦。

一、“正名”的主张和实践触及了当权大夫的利益，成为孔子周游不遇的最重要的原因。孔子周游列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求仕，但却屡遭排挤和谗毁，有时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究其原因，主要应归于孔子当下的为政主张和为政实践，也就是说，“正名”是造成他遭排挤的最重要的原因。

“正名”既是孔子首要的为政纲领，又是他的首要的为政行动。《子路》中载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那么“正名”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把混乱了的封建等级秩序重新匡正，使之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要求（按：“正名”一词是孔子晚些时候才提出的，但其实质内涵却早已提出）。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正名”呢？原因是当时社会已经“名不正，言不顺”，周王朝已形同虚设，令出于诸侯，权归于大夫。这与孔子所追求的文武周公时代的礼乐文明完全相背了。因此为了实现其建立“东周”的伟大理想，孔子提出了“正名”这一首要的当下为政主张。那么他又靠什么来“正名”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德治和礼让。因为“正名”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专权的诸侯、大夫的，故必然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用德治和礼让去“正名”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情况下，“正名”的重要手段应是武力和法治。孔子也是这样做的。孔子为大司寇时领导实施的“堕三都”军事行动，不正是他以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正名”计划么？孔子为大司寇的时候，鲁定公已有名无实，三卿（季氏、叔孙氏、孟孙氏）擅权；“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sup>[1]</sup>。而三卿之家的权势又被家臣所垄断，即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这是违反尊王忠君之道的，孔子对此很是不满。为了强公室、抑三卿、贬家臣，孔子提出了“堕三都”的计划，并亲自指挥曲阜之兵，摧毁了费邑（季氏家臣的城堡）。但最后“堕三都”的计划还是失败了，因为回过神来的三卿已认识到：孔子的“堕三都”不光是要削弱家臣的势力，而且还要削弱他们自己的势力，其最终目的是“强公室”。这是与三卿的最初愿望相反的，他们当然不干了。故孔子以武力“强公室”的计划没能实现。然而此等大事必为众诸侯所知，对各国的当权大夫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孔子正名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他们的。这也必使他们对孔子怀有很大的警惕和怨恨。

事实上，早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因鲁乱而适齐，与齐景公谈政，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主张（即是后来的“正名”）因为当时齐国的政权业已操在了卿大夫手中，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sup>[2]</sup>在孔子看来，齐国之政的当务之急便是加强齐侯专政，削弱大夫势力，所以他一针见血地为齐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的为政方略。孔子“君君、臣臣”为政方略的矛头是直接指向齐国专权大夫的，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恐惧和怨恨，于是才有“齐大夫欲害孔子”。（这欲害孔子的齐大夫定然是陈恒之流）孔子听说有人欲加害于自己，而齐景公又无可奈何，只有离开齐国。因此，孔子离开齐国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正名”主张危及到了齐国专权大夫的利益。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直接

原因也当在此。

《孔子世家》说：“孔子适卫……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sup>[2]</sup>这里的“或”肯定是卫国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凭着孔子的威望，鲁卫又是兄弟之国，卫灵公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之言而疏远孔子的。那么，这个“或”为什么要“谮”孔子呢？原因是孔子的到来对他们构成了某种威胁。而能够使当权者心惊胆战的，不是他那德治的主张，因为德治只不过是“迂阔”而已，根本对他们的权势构不成威胁。只有他那针对违礼大夫的“正名”主张和“堕三都”的行动，才是“或谮孔子”的直接原因。在当权之人的排挤之下，孔子也不得不“去卫”了。

《孔子世家》又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礼记·檀弓》载桓魋为自己造了一口石椁，花了三年时间尚未完成，孔子知道后，批评他说：“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sup>[3]</sup>意思是说：像这样的奢侈，死后还不如尽快腐朽的好。后人便推测孔子之话激怒了桓魋，故欲杀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桓魋也许是想杀孔子，并且以他在宋国的地位，杀孔子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不可能是因为一句话就杀人。桓魋没有杀孔子，大概是孔子的名声太大了，他只是拔倒了孔子习礼于其下的大树，借以来吓唬孔子，其目的是阻挠孔子入宋。那么桓魋为何要阻挠孔子入宋呢？我们来看桓魋的背景。司马桓魋是宋桓公的后代，宋景公的宠臣。据《左传·定公十年》载，宋景公曾因桓魋的缘故而逐其两个兄弟：公子地和公子辰，导致地、辰入于萧而叛乱。又《左传·哀公十四年》说：“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杜预注：“恃宠骄盈。”杨伯峻说：“疑不仅骄盈而已，盖已势不两大。”<sup>[4]</sup>后桓魋恃权叛君，失败奔卫。可见桓魋当时是宋国炙手可热的权臣。桓魋的专权和孔子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桓魋自己也十分清楚。如果孔子入宋，他的“正名”的主张必定会给桓魋的权势带来极大的威胁。这才是他“欲杀孔子，拔其树”，以武力阻挠孔子入宋的真正原因。由于“正名的威力”，孔子被阻挡在宋国的大门之外了。

《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不得志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赵简子杀襄鸣犊、舜华（襄、舜本为贤者，赵简子始用之，终杀之）临河而叹，终不至晋。《赵世家》评赵简子说：“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sup>[2]</sup>可见赵简子也是孔子发起的这场“正名”运动所针对的对象。孔子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他的“正名”主张必和赵简子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他入宋，必也会遭到襄、舜之灾，故此才有临河之叹。

《孔子世家》又说：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往聘，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sup>[2]</sup>可见“围孔子于野”是陈蔡“用事大夫”的计谋。原因是孔子“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那么“诸侯之疾”是什么呢？当时诸侯最大之“疾”便是大夫专权，也是孔子所“刺

讥”的。就连陈蔡大夫自己也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孔子之意,害怕孔子至楚会对他们不利,故发兵围之,以阻挠孔子入楚。从根本上讲,还是“正名”惹的祸。

另外孔子入楚,楚昭王欲以地封孔子,却遭令尹子西的谗言,其原因也当在此。在此就略而不谈了。

上述的桓魋、赵简子、陈蔡大夫、令尹子西,还有那个在卫灵公面前讲孔子坏话的“或”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各国专权的大夫,当然也都是列在孔子“正名”名单之上的。在耳闻目睹了孔子当下的为政主张和在鲁国的为政实践后,他们对孔子的到来必定怀有极大的恐惧之心和敌对情绪,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对孔子之行加以阻挠。这正是孔子周游列国而不遇的根结所在。所以说,孔子“正名”的主张和“堕三都”的实际行动才是他周游列国不遇的最重要原因。

二、昏君乱邦是造成孔子“不遇”的又一原因。孔子周游不遇,大多数是在遭受别人的排斥下不得不黯然离开的,但也有他主动求去的。其原因是有的国家不能为孔子施展才华提供适宜的土壤。孔子周游列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求仕,最终目的是推行他的大道。而在那个时代,推行大道的首要条件是:依靠最高统治者,求得他们的帮助。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希望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实现理想的贤明国君。可是有的国君昏庸无能,根本不能作为实现理想的依靠,如卫灵公,虽表面上任用他、尊重他,却一直是把他当作一面“尊贤”的招牌来养活着,即孟子所谓的“际可之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sup>[2]</sup>这种“尊重”和孔子希望得到重用的思想是相违背的。孔子自己就曾骂过卫灵公,《宪问》中说:“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sup>[1]</sup>又《卫灵公》:“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sup>[1]</sup>其实孔子一开始对卫国还是情有独钟的。一方面是因为“鲁、卫之政,兄弟也。”<sup>[1]</sup>另一方面,卫国有实现其大道的基。《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sup>[1]</sup>这段话是说,孔子一进入卫国就有一种“人口兴旺”的感觉;“人口兴旺”在当时常常是安定富庶的标志。<sup>[5]</sup>孔子正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民富足,然后施以教化,最终实现自己的宏大理想。所以他先后在卫国呆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因为卫灵公的昏庸,使得孔子如笼中大鹏,无法展翅高飞,后来不得不离去了。再如晋佛肸以中牟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但最终却没去。原因是佛肸之叛本来就是违礼之举,是孔子所说的“其身亲为不善者”,故“君子不

入”。有的国家如陈国,本来就是小国,加之国君无能,又常遭受吴、楚等大国的夹击,故“陈常被寇”。这样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更不适合孔子的要求。故当吴、楚交相侵伐时,孔子去陈。

另外,从孔子自身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主动离去和他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孔子性格耿直,为人光明磊落,反对花言巧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sup>[1]</sup>“巧言、令色,鲜矣仁。”<sup>[1]</sup>他赞美耿直的史鱼:“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sup>[1]</sup>他直言不讳,骂卫灵公“无道”,讥刺季氏的“八佾之僭”,批判司马桓魋,他向一切“违礼”现象进行着猛烈的抨击。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sup>[1]</sup>“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sup>[1]</sup>其实,在那个礼乐衰败的乱世,正直如孔子一样的人是行不通的,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sup>[1]</sup>李泽厚《论语今读》引《集解》(皇疏)引范云:“祝鮀以佞谄被宠于灵公,宋朝以美色见爱于南子。无道之世,并以取容。”<sup>[6]</sup>可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不光表现在他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上,他那“一以贯之”的大道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光辉人格上。孔子正直不屈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乱世的悲剧命运,他不会向统治者点头哈腰,奴颜婢膝以求施舍。“堕三都”受挫之后,季桓子沉迷于声色,生活更加腐败,孔子没有与他沆瀣一气,而是丢掉荣华富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sup>[1]</sup>弃大司寇之位如弃敝履。在去留问题上,孔子的气节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综上所述,孔子为追求理想,周游列国,却终不得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正名”主张和实践触及了当时各国当权大夫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排斥。真是成也“正名”,败也“正名”。另外,昏君乱邦及孔子自身的性格特点也是导致他周游不遇的两种原因。

[收稿日期] 2006-06-08

####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 1980.
- [2] 司马迁. 史记[M]. 中华书局, 1982.
- [3] 杨天宇. 礼记译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中华书局, 1990.
- [5] 匡亚明. 孔子评传[M]. 齐鲁书社, 1985.
- [6]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贺永泉]

## 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Why Confucius Failed to Get an Important Position

Lv Huali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his ideals Confucius visited various states, but no one put him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The reason didn't lie in his doctrine which is said to be impractical but in following two aspects: his political practice, and his political view which aimed at adjusting confusion of feudal order; fatuous rulers and states of turbulence.

**Key words** Confucius failure in gett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reason